

《资本论》的技术批判与共产主义

刘雄伟

[摘要] 尽管 20 世纪之后出现的飞机、核武器、互联网以及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等，都是马克思无法预见和想象的，但马克思在技术工业方兴未艾的 19 世纪中期已经天才般地觉察到了一个由技术——资本主导的新时代的来临，并开始自觉反思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在对技术的反思上，马克思的思路明显优于 20 世纪以来的技术哲学家们。马克思的基本判断是，现代科学技术从根本上不仅是理性力量的体现，更是资本逻辑支配的必然结果。因此，对现代科技的反思，不能仅仅囿于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而必须要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重思《资本论》中的技术哲学，不仅能够激活马克思哲学在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时代的理论魅力，而且能够使我们科学地展望由现代技术规定的未来新文明的方向。

[关键词] 技术批判；《资本论》；共产主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现代技术和由技术所规定的人类文明进行了深邃的思考。然而，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晦暗不明的。不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么抽象地争论马克思到底是不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要么囿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尤其是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哲学思考来阐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为了从这种严重的误读中摆脱出来，这里有必要澄清《资本论》的技术批判。某种意义上讲，《资本论》的资本批判是同其中的技术批判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正是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和技术的反思，马克思预见到了一个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终将到来。

一、技术与虚无

对于 20 世纪来说，世界性的科技潮流的涌现应当是最值得回味的事件。飞机、电视和网络等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技术都在这个世纪应运而生。与此相应，大批哲学家们开始关注现代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专注于探究这股来势迅猛的科技潮流究竟会在何种形式、何种规模和何种速度上影响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起初，不少人对科技的发展持盲目的乐观态度，认为不需要变革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只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人类就能够彻底解决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刘雄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历史客观性观念与虚无主义批判研究”（18YJC720013）。

科学技术似乎一时间取代了上帝,成为了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科技拯救人类”固然是整个20世纪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一口号并没有多少理论深度可言,它甚至潜移默化地掩盖了由技术所引发的诸多社会弊端和危机。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那些真正扬名于世的哲学家们都不是流俗的科技歌颂派,而往往是以批判科技的思想姿态现身。这些对技术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从不同侧面剖析了技术与社会症结的内在关联,并由此而揭示了由技术所诱发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

毫无疑问,现代科学与技术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自由,不仅如此,它还通过与现代教育的结合,在很短时间内让全世界各族民众的精神空间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正视现代科技的这一积极的社会效应是在哲学上反思它的基本前提。如果人们不能够正视现代科技巨大的历史功绩,则势必会在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反思上陷入消极的浪漫主义旋涡。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现代科技在给人类带来方方面面的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乃至前所未有的挑战,它甚至阻碍了现代人的美好生活的进一步实现。正如许多反思现代技术的哲学家们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技术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彻底解构了人类的精神生活,致使人类的现实生活虚拟化,甚至逐渐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语境中,“技术”往往是一个哲学家们为了批判现代社会而建构起来的消极性概念。而如何应对技术给人类造成的精神挑战,也成为现代哲学家们最为关切的理论话题。

在对技术的考量中,海德格尔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曾形象地用“人被连根拔起”来说明由技术所引发的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在1938年所做的《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讲座中,海德格尔专门阐述了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于科学的本质,海德格尔说,“筹划(Entwurf)与严格性(Strenge),方法(Verfahren)与企业活动(Betrieb),它们相互需要,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①。海德格尔特别重视科学的“研究”,认为它“标志着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它的历史的决定性阶段”^②。“研究”的本质在于研究者通过预先或者事后对研究对象的精密算计,使得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世界完全成为任人摆布和支配的对象。从哲学上来看,作为现代科学的“研究”,意味着人作为主体的大获全胜,同时也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彻底疏离。这就为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来临留下了隐患。

现代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就是现代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比现代科学更深入地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一般来说,人们会把技术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成果的实践转化和应用,但实际上,特别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技术本身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技术表现为人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宰制,“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③;另一方面,现代人本身也连同自然一样受到了技术“座架”(Gestell)的支配,从而彻底沦为工具性的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技术从根本上标志着现代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无根”生活之中。自然科学与技术在现代社会的肆虐,同时也导致了艺术和“诸神”的逃离,于是乎,世俗生活和世俗幸福成为人们唯一肯定和追求的东西,梦想与希望失落了,人类由此而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窠臼之中。

很明显,海德格尔深入刻画现代科学与技术,并不是为了像常人那样赞美它,而是想克服它,进而让人类走出由技术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与技术深深地根植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土壤之中,因而不理解现代形而上学,就不可能真正破解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症结。换言之,

^①[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895页。

^②[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94页。

^③[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32页。

如果人们非批判地使用“科学”和“技术”的概念,而不是把它们同现代形而上学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批判终将不得要领抑或功亏一篑。

在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形而上学拷问中,海德格尔提出,现代科技以控制论为基本特征,它首先把自然当做思想的对象,进而把自然纳入逻辑范畴中,实现对存在者领域的分割、规定和宰制。这显然在理路上同柏拉图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柏拉图主义哲学扭转了古希腊思想中的非对象化之思,实现了以理论的方式来把控实在的话,那么,现代科学与技术则把这种理论所固有的把控实在的能力全面地释放了出来,最终完成了对实在的现实把控。

海德格尔深刻地看到了柏拉图主义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一致性,所以他把“科学之发展”诊断为“哲学之完成”,认为它们都把“存在”遗忘了。海德格尔说:“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世界内的发展。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①基于对哲学和现代科学“遗忘存在”的思考,海德格尔进一步推导出了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困境。就是说,现代人在传承形而上学思维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座架把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当做技术改造的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割断了“人生在世”的原始结构,在把人连根拔起的同时也让人类彻底陷入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危机之中。

无疑,海德格尔对哲学与现代科学“遗忘存在”的指控,意在唤醒人们超越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维,进而从技术的危险中摆脱出来,最终实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比其他专门从事技术批判的思想家们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指证为现代科技的深层根基,从而把对现代科技的反思,最终归结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的重大理论贡献也就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思维的存在之思。在他看来,古希腊的诗性之思比后来柏拉图主义之思更为充盈和生动,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存在”。如果此在始终以存在之思而在世,那么,他必然能够领会“存在”的意义,进而实现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这就意味着,现代人只有重新回归古典思维,以非规定性的诗性之思来取代以往形而上学的规定性思维或者说技术思维,进而唤起存在的意义,才能走出由科学技术所引发的“无根”的生活。

不过遗憾的是,海德格尔从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机制入手批判现代科技的思路虽然深刻,充满理论的想象力,但却并没有现实地阻止现代性的步伐,不得已,他最终只能在对天地神人四重奏的玄思和向往中步步陷入神秘主义的窠臼之中。就此而言,与其说海德格尔克服了由现代技术所诱发的社会危机,还不如说他深刻地刻画了由技术所主导的现代性进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而非现代形而上学才是现代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深层动力,因而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行的深层逻辑。因此,要真正颠覆由现代科学与技术所引发的诸多负面效应,就必须彻底瓦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由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②。可见,归根到底,正是由于现实历史中资本逻辑的存在,现代资本主义才会极力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进而享有对自然资源的绝对占有。

相比之下,海德格尔虽然深刻地揭示了由现代科学与技术所引发的诸多现代性困境,但却仅仅

^①[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

把对科学技术的批判看做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哲学问题,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现实历史的本质性向度之中,所以他并没有完成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彻底批判。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运思轨迹上来。

二、《资本论》的技术批判

作为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理论巨著,《资本论》及其手稿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实现的,该书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提示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也会把《资本论》看作是一部专究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经济学巨著。这一点无疑是对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首先包含着一种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或者说它隐含着一种深邃的技术哲学。这一点显然是以往的学者很少关注的。众所周知,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根本性意义。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与技术在根本上制约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也间接地决定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因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不可能不关注现代科学技术。

从历史来看,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就是19世纪的欧洲,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时期。此时,在新技术的推动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无疑,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由新的技术所推动的新的时代的到来,因而他才会感叹道,“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用以生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水推磨的话,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用以生产的劳动资料则是从蒸汽机起步的。正是蒸汽机,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直接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

不过,如前所述,马克思虽然关注现代技术,但却并不是从哲学抑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量技术进步的深层动因及其社会效应,而是把它回置到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来考察。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现代科学技术从根本上不仅是理性力量的体现,而且更是同资本主义独特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这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作为人的身体的延伸,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是中性的,它所显露出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本质上来说,是由自身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就像对宗教的虚幻本质的解释不能到宗教中去寻找,更不能到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中去寻找一样,考量现代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也不应该从技术本身出发,更不能从哲学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而必须要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正是因为马克思彻底出离了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视域,把对现代技术的反思,转换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对“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更为本质性的领域的批判,所以他真正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技术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它成功实现了劳动与财产的分离。具体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与财产是直接同一的,劳动者本身就是劳动成果的直接占有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者是所有者”^②,生产的目的是“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③,而不是为了财富的积累。然而,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劳动与财产的原始同一性逐渐被瓦解了。马克思说:“等价物的交换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7页。

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①这就是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传统的生产方式遭到破坏,劳动与财产实现了分离,劳动者不再是财产的直接占有者,而成为脱离客观生产条件的无产者。与此同时,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也与这些无产者对立起来。马克思说:“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②

显然,劳动与财产的分离,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其客观的生产条件从昔日的肯定性关系转变为一种否定性关系、对立关系。这其实也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我们也可以,“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内容就是劳动与财产相分离的过程。随着资本的加速积累,资本对自由工人的财产侵犯也必然会不断加剧,而二者之间的对抗也会日趋严峻。不过,资本对自由工人的财产侵犯虽然表现为不断加剧的过程,但这种侵犯却始终具有隐匿性和迷惑性,很难被人发现,因为它实质上“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的劳动”^③,也就是表现为在自由平等的幌子下对劳动者的侵犯。为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也就是“商品”出发,澄清了作为资本增值基础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通过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

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意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缺陷,因而转向从哲学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量技术。与之不同,马克思则深刻地意识到,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劳动与财产的分离,才使得技术对于人而言成为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如果从“劳动与财产相分离”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技术之所以需要给予“批判”,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应用。换句话说,正是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应用,才致使它自己出现种种的负面效应,显示出“恶”的一方面,甚至沦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帮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现代技术与人性的对立。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一方面由于依托资本增值的逻辑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完全依托资本增值的逻辑,技术本身也出现了异化,最终沦为压抑人性的工具和手段。

马克思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技术异化。其一,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技术,致使单个工人的劳动遭受到了社会的排挤。毋庸置疑,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固然有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也确实极大地加速了资本的增值,但它以机器这种自然力来代替人力,势必会弱化单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对此,马克思说,“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④。其二,机器的使用,特别是机器对人力的取代,导致了劳动人口的绝对过剩。《资本论》中有大量的篇幅讨论机器对工人的取代以及由此而导致劳动人口大量过剩的案例。马克思说:“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⑤最后,技术的迅猛发展,再加上过剩劳动人口的出现,使得资本在实现自我增值的过程中愈加变得肆无忌惮,甚至日益突破工作日的自然限度和道德界限,某种程度上让工人的劳动变得更加枯燥、野蛮和无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6页。

应该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缺陷中去寻找技术异化的根源,是马克思在技术哲学领域所做出的最卓越的理论贡献。遗憾的是,后起的技术哲学家们却没有完全继承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一崭新的运思方向,而是重新堕入启蒙哲学的视域之中。在今天,发掘马克思关于技术批判的理论资源,除了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启蒙理性的一般性批判外,更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可能是深究马克思如何超越启蒙哲学的视域而直接转向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批判。

诚然,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有关,特别是离不开资本增值逻辑的支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技术本身的迅猛发展,也反过来在不断加剧劳动与财产的分离,促使资本奴役劳动者的内在本性彻底释放了出来。尽管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技术远远没有像 20 世纪那样实现喷发式的发展,但马克思已经洞见到了技术自身正在衍生为一股不受控制的主体性力量,在无情地摧残着工人的肉体和灵魂。马克思提出,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彻底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而且甚至颠倒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是工人支配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支配工人。但是,只有机器才第一次使这种颠倒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①。这一重要的论断意味着,资本正是借助技术的中介实现对人的彻底宰制,最终导致人性中本有的丰富内涵被蒸馏了,剩下一个个被异化了的原子式个人。可以设想,如果离开机器等技术的中介,工人是不可能被工厂彻底裹挟,总会保持或多或少的主体性和自由。

马克思之后,西美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本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的异化。西美尔发现,技术时代的来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精神异化,人类开始越来越疏离于自身存在的完整意义。西美尔说:“灵魂的精神性和专心镇静在自然科技时代喧嚣的辉煌中麻木了,造成了紧张和茫然地追求的某种模糊感的恶果,造成了一种感觉,即离我们的存在的完整意义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我们无法锁定存在的完整意义,处于不断地远离它而非靠近它的危险之中。”^②当然,对技术引发的人的异化进行更系统、更深入剖析的,当属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觉从《资本论》中吸取必要的理论资源,并在许多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从事技术批判。这些成果,一方面有效应对了新的时代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也拓展和深化了《资本论》中的技术哲学。

三、技术批判与共产主义

海德格尔哲学无疑是当今世界上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症结做出最深刻反思的哲学之一。技术问题当然是海德格尔个人所关注的问题,但它同样也是近代以来工业社会时代所面对的一个时代性问题,更是在工业文明之后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人们所普遍面临的时代问题。不过,虽然海德格尔反思技术的路径确实深刻地揭示了由现代科学与技术所引发的现代性困境,而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为更深层地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也不得不承认,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肆虐,并不是根源于现代哲学所彰显的主体理性,而在于主体理性背后所潜藏的“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更为本质性的领域。海德格尔的科学技术批判由于没有触及到这一更为本质性的领域,而仅仅专注于对主体理性的哲学批判,这就注定他的批判路径不可能获得成功。归根到底,海德格尔依然是一位“解释世界”的经院哲学家。在技术反省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除了要利用技术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427 页。

^②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 394 页。

显自身的主体性自由之外,还需要同技术保持必要的距离,以防止完全被技术的运作逻辑所裹挟,或许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诗意的生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是在存在论的原则高度上来考量现代科学技术的,但他的技术批判却迥异于海德格尔哲学。马克思始终把技术同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诊断结合起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新技术的发明,特别是自动化机床这种新型的工具机的出现,加速了劳动与财产的分离,从而也就更为明显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更为重要的是,由新技术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统统落入资本家手中,这就使得无产阶级队伍加速壮大,而阶级对立也变得更加不可调和。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技术的进步只会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崩溃和共产主义的来临。

马克思的这一判断遭到了20世纪以来的许多理论家的质疑。马尔库塞指出,现代科学与技术非但没有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反而在不断强化资本主义的统治。一个明显的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衰落,恰恰相反,它借助科学技术的形式以更加强大的力量支配了人们的思想。马尔库塞说:“工艺的真理性是意识形态的内核,而工艺的合理性则是一种统治人的虚假意识。”^①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或许只有同艺术及形而上学结合,才能摆脱其功利性特征,最终成为人的解放的手段。这一思路相对于《资本论》来说显然是一种历史倒退,它充分反映了当代的理论家们,甚至包括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道路的不自信。

应该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内在矛盾。首先,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协调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走向更加全面的社会化。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和兼并,使得垄断资本更加集中,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此而言,马克思当年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亦即生产的全面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有效的缓解,反而是加剧了。

其次,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另一大矛盾,亦即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民有限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样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有效的缓解。诚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空前地提高了,但劳动人民的支付水平相对而言却是在不断缩小,而不是增强。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得更为严峻。我们知道,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开始担忧生产中过度的机械化会导致工人的失业,但以往的历史表明,随着旧职业的消亡,就会有一些新的职业出现,至少,人类在信息认知和处理方面的先天优势,是机器永远不可能取代的。然而,人工智能及其与物联网等相关领域的高度融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认知和处理信息的优势也正在消失。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少的劳动要素被要求释放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产品。这也就意味着,劳动逐渐被资本所置换,物质资本自身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产品,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以工资劳动形式出现的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了。随着资本的集约化以及技术对工人的极端排挤,大量的雇佣工人正在被驱逐出生产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消费能力,相对来说,必然会大大萎缩。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不但没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反而是放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固有缺陷,使得资本主义统治变得更加脆弱,甚至危机丛生。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人

^①[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如此之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对技术——资本所规定的现代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上。人们开始重新认真思考共产主义的真实意义了。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异化与异化的扬弃是同一条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瓦解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同一个过程。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制造或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如果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语境来思考共产主义的话,就会发现,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按“欲”消费的终结和按“需”消费的来临。我们知道,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曾把宗教看作是有缺陷的定在,认为它是人类异化的表征。正是因为人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转向虚幻的彼岸世界来寻求精神慰藉。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宗教,就是因为它扭曲了人的精神欲求,把人的精神欲求完全转移到了彼岸的虚幻世界之中。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中合理地推导出他对消费异化的批判,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同样扭曲了人的物质欲望,它把人的基本物质欲求扭曲为无止境的商品消费欲望。商品消费由此成为了行使宗教功能的“鸦片”。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这一论述意味着,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所谓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毋庸置疑,一方面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以便能够生产出更多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物质产品,但另一方面,它也依赖于人类的分配正义以及对自身无节制的消费欲望的限制。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已经表明,如果人的消费欲望被无限度地激发的话,那么,物质资料则永远会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遗憾的是,包括柯亨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关于“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解读,仅仅考虑到了生产力提高的客观性方面,而忽略了主观性欲求的领域。他们以为,在马克思那里,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生产力能够而且必然会无限提高,以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所有消费欲求都将会获得满足。

事实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的真实意义倒并不在于精确生产出人类想要的全部产品,从而满足人类的全部欲望,而在于它可以使人类从非人的机械性劳动中解脱出来,从异化劳动和分工中解放出来,让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从事更加有意义的生产形式,如艺术、文学和哲学等。归根到底,共产主义的落脚点并不在于物质资料的无限生产,而在于人的“个性自由”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抵制。青年马克思已经提出,人的生命意义的彰显,应该通过对人自身生命中固有的力量的发展、训练和表达来完成,而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被动的商品消费。这也就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要真正摆脱危机,实现转型,就必须要有控制商品生产的广告活动,通过培养人的生命中固有的能动性力量,来创造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以此抵制消费文化的过度泛滥。可喜的是,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过度的物质消费不但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必然会导致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的破坏。正因为如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开始厌倦日复一日的商品消费,显露出一种努力寻求人性意义上的价值和意义的趋势。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技术在当代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虽然还没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但却已经成功地将它推移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雇佣关系推移到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306页。

们的经济生活的边缘,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塑造社会生活和人的存在方式方面的能力正在衰弱。人类出现了迈入新的文明形态的征兆。根本上说,共产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但另一方面,它更是对一种对人的本质的回归方式,是一种人类对自身的本性和存在经验的新的觉解。让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这一论断上来:“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①异化与异化的自我解构是同一个逻辑,这是辩证法的真谛。在今天,自然科学与技术已经获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正在加速完成“非人化”,正因为这样,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自然科学与技术也正在积极“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共产主义的来临做铺垫。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Techn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 and Communism

LIU Xiongwei

Abstract: Although the aircraft, nuclear weapons, the Internet,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earing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all unforeseeable and unimaginable to Marx,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hen th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ere in the ascendant, Marx had already developed a perception of genius that a new era dominated by techno-capital was coming and accordingly begun to consciously reflect on the socio-political effects of technology. In terms of the reflection on technology, Marx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is basic judgment is tha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rational power,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apital's logical control. Therefore,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but should be upgraded to a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Capital* can not only activate the theoretical charm of Marx's philosophy in our technological age, but also enable us to scientific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direction of a new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prescribed by modern technology.

Keywords: critique of technology; *Capital*; communism

About the author: LIU Xiongwei, PhD in Philosophy,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